



钢铁子弟兵

第一集

通俗文艺出版社



鋼 鐵 子 弟 兵

(第 一 集)

通俗文艺出版社編輯部編

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

鋼鐵子弟兵

(第一集)

封面設計：張文瑞

※

通俗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

室文堂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經售

※

總號(文)0286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5 插頁4 字數122,000

1956年1月第一版 195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47,000

統一書號：T10023·263

定價：(5)五角

出版者的話

中国人民解放軍，自从一九二七年建軍以来，已經经历了在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全体指战員，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鮮血，写下了无数不朽的詩篇，完成了偉大的民主革命，并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奠定了穩固的基石。

中国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为了紀念这个光荣而偉大的三十年，曾发起了一个“征文运动”，并将一部分应征文稿，在各个报刊上陸續发表。这些文章，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种战斗崗位上，記錄了中国人民解放軍三十年来艰苦奋斗的豪迈事迹，它是一部丰富、生动、真实的英雄史詩，又是一部极其壯闊絢丽的文学巨著。

中国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对于这些应征文章，是特別重視的，除在报刊上先行发表一部分外，并将有系統地把这些文章整理起来，彙成专集。但此事工程浩大，并不是短时期內所能完成的。我社为了使广大讀者能够較先的閱讀到这些瑰丽的作品，特征得“解放軍三十年”編輯部的同意，从已經发表的征文中，选出一部分，用“鋼鐵子弟兵”作为書名，分三冊出版。

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想帮助讀者对于中国革命艰苦的历程有一个更深刻具体的理解；一方面鼓舞大家从人民解放軍身上，学习他們各方面的优良傳統和高貴品質，以披荆斬棘的精神，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

目 录

蓮花一枝枪	龔 鉄 (1)
我跟父亲当紅軍	吳 华 夺 (7)
紅軍炮兵的誕生	鍾 生 盛 (13)
我們成了紅軍战士	侯 世 奎 (17) 徐 承 俊
紅要紅到底	鮑 启 祥 (20)
千辛万苦寻紅軍	賀 梦 先 (26)
敌后游击斗争	林 維 先 (40)
“我們都是紅軍”	王 群 (46)
紅軍，紅軍，彝民的亲人	阿尔木呷 (51)
架浮桥过烏江	何 力 斌 (60)
夜取遵义	王 集 成 (65)
巧渡金沙江	肖 应 棠 (71)
大渡河畔英雄多	楊 得 志 (81)
在大渡河下游	刘 忠 (89)
泸定桥畔	姚 国 民 (97)
筹粮过草地	李 湘 濤 (101)
万“苦”流芳	譚 清 林 (105)
长征中的小宣傳員們	廖 兴 文 (111)
渡过了最艰苦的一刻	何 华 章 (116)
保卫党中央的一战	張 光 华 (121)
不倒的紅旗	譚 清 林 (125)
妇女团被圍記	彭 珍 (128)
难忘的河西三个月	戴 克 林 (135)
忆渡黄河之前	晉 思 玉 (145)
强渡黄河	晉 国 华 (150)

蓮花一枝槍

龔 鉄

在井岡山區，老一輩的鄉親們還會記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曾經流傳過這樣一首歌謠：

陳精進一枝槍充團長
一枝槍啊追朝湘
追得（那）朝湘（唉唉）到處鑽

這首歌謠一直激動着年青赤衛隊員的心，給我們留下了忘不掉的自傲的感情……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罪惡的“馬日事變”。同年八月當反革命軍隊打進江西省的時候，蓮花縣糾察隊的領導人陳朝湘剝掉了革命的外衣，露出反動資本家猙獰的面目。糾察隊六十枝槍被他攫走了五十九枝。

陳精進帶着我們六個同志逃出了虎口，來到城北的九都村。我們七個人唯一的武器，就是賀國慶和蘇廣明拚着生命搶出來的一枝俄國步槍——這枝古老而結實的槍，就是毛主席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里寫的：“蓮花保存一枝（槍）”。

在九都沒過多久，我們重新組織起來的赤衛隊已擴大到一百三十多人。陳精進當團長，賀國慶為我們中隊長。我們有許多紅纓槍、鳥槍和竹筒槍^①，但是真正的槍全團還只有那一枝俄國槍。

要鬧革命就得有槍！於是我們選出了蘇廣明、王仁妹、蘇國貞、楊潘和陳建五個同志，先後混進蓮花城里，加入了陳朝湘的

^① 光能吓人不能傷人的土制武器。

靖卫团，等待着机会。

九月的一天，陈朝湘带领了八十来个靖卫团员向九都开来，要来清剿我们。我们得讯后就隐藏在九都附近的山里。第二天夜半时光，我们包围了他们睡觉的新兴饭店。贺国庆端起了那枝真正的枪，“砰”地一声打响了赤卫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战斗！

早已联系好的五个同志，马上背了六条“湖北条子”^①（王仁妹还拿了别人的一枝枪），回到自己的队伍里。这样，七枝步枪加上几十条鸟枪和竹筒枪，瞬时打昏了敌人的头脑，不知我们来了多少人，有多少枪啦。

我们一面打一面还高声大叫：

“把陈朝湘交出来！”

“缴枪不杀！”

敌人在屋子里顽抗。我们冲开了第一道大门，他们堵住了第二道大门，爬在第二幢楼房里放枪。我们正想攻第二道大门，讨厌的东方却泛起了灰白色的云块，天要亮了。天一亮，如果给敌人发觉我们只有六条枪，那是很危险的。无奈何我们只得退了。同志们恨的咬牙切齿，临走时给他放了把火。

当天下午，陈朝湘糾合了隴西、上西两处的地主武装，从两个方向襲过来。隴西的敌人对这里的地形是不熟悉的，陈团长决定先打他们。

我们躲在山上的树丛里，等这些送死的腰包走到山脚下，几尊土炮“轟”地一下把几十斤铁粒子，朝他们迎头扑过去，紧接着在一片震天撼地的喊杀声中，我们发起了冲锋。

敌人最害怕面对面地拚杀，一见我们冲锋，他们转身就逃，我们就紧追。追了十五里路左右，八十多个敌人往两面山坳里逃的一个也不剩了。这回共缴了十一枝步枪，总算还够本。

敌人连着吃了两次亏，一定不会甘心。和他们硬拚是使不

① 一种步枪的名称。

得的，因此县委命令我們退到永新县附近的和山山区。

县城里的两个靖卫团員李海云和严富成，知道我們在和山，他俩就背了四枝步枪来投奔革命。說起李海云可真是了不起，天上飞着的麻雀，他一举步枪不用瞄准就能打下来！可是，这回多余的两枝枪我仍旧沒有分到手啊！

大約是快到九月底的这一天，陈团长把我和刘培益、刘雨华三个人喊了去，對我們說道：

“喜事来了……”說着望着我們微微地笑了起来。

难道又要去打靖卫团繳武器嗎？

我們正在猜啊猜的，陈团长站起来拍拍年紀最小的刘雨华又說：“毛主席要送三枝枪給我們团，决定派你們三个人去領，領回来就归你們背。这么样，該是桩喜事吧！”

这，难道是真的？……我們三个人扭轉身就奔到宁崗梅花山，在紅軍政治部里領来了三枝“比国造”。回来的路上，我們不停地用手指头頂着衣袖，擦着摸着，心里还在說着：“总算熬出来了，又有三枝真正的枪了！”

真正的枪，到目前为止，我們一共有二十八枝。

一九二八年夏天，蔣介石把他的第六軍的三个师調来打我們。他們挨家挨戶地进行清乡。高洲区苏維埃主席謝恒标四兄弟全給杀了，許多赤卫队員的家屬也遭到慘杀。我們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根据上級指示，我們的二十八枝枪必須暫時隱藏起来。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夜晚：賀国庆帶着我、刘培益和老楊头（忘了他的真名），四个人悄悄地来到一个山谷里。我們把带来的二十八枝枪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才恋恋不舍地埋藏起来。然后，我們对着黑夜的长空，对着山下乡亲們的土地和房舍，用紅色战士的名义起誓：

“如果我被敌人抓住，头可断，藏枪的地方决不說出！”

天明以后，又遇到了敌人清乡，我們四个人都被冲散了。我独自躲在沒有收割的稻地里，挨过了整整七个白天和七个黑夜。

白天，太阳晒得头昏脑脹。半夜里露水落下来，渾身上下又是一片湿。但总算在乡亲们們的掩护下，沒有暴露也沒有餓死。

不久，我們接到县委的通知，离开了山区，来到浙贛铁路边的宜春县城。謝德兴同志带着他的妻子，在車站附近开了一家飯店；謝振兴同志混在国民党县党部里当“师爷”（即文書一类的职务）；我和謝凤山两人領了八块鋼洋，干起了燒炭的买卖；还有……加上老楊头这个一忽儿化装成乞丐、一忽儿又化装成商人的聯絡員，我們十多个人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組成了一个聯絡站。聯絡站不断地把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文件，和駐在城內的何鍵部队的动态，輸送給县委。

重阳节来到了，国民党軍隊高高兴兴地等着发餉銀。

用乡亲们們的話來說：“这真是天意！”事情是这样的：

謝振兴同志相熟的一个姓張的营长，碰巧賭运不佳，一个通宵把全营的餉銀輸光啦！发不出餉銀，許多官兵把他告到团长那里。他聞說团长要杀他的头，急得走投无路，連夜来找謝振兴帮助。謝振兴就趁此机会动員他投奔紅軍，并且还給他下了保証：如果他能將全营的武器带去，还可以繼續当营长。

再也沒有第二条路了，他向我們賭咒，說是：

“我張某如有三心二意，出門炮子穿心！”

于是，我們带着这个起义的营离开了宜春。走到武工山附近，被国民党軍隊何鍵部攔上了，一仗打下来，回到蓮花时只剩了两个連。

接着县委召开了扩大會議，把起义的营和赤卫队合編为“蓮花县紅色独立团”。陈精进为团长，刘緒川为党代表，起义的張营长为团參謀长。賀国庆当了三連連长，我是他的一班副。我的班长就是那位神枪手李海云。

十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們团在井冈山受了一个月的訓練后又回到九都，听当地乡亲们報告說：离这儿三十多里路的南波村有个名叫楊良盛的大劣紳，他最近买了九十六枝步枪，还有一枝

快慢机、一枝手枪和一枝駁壳枪。

同志們得知了这个消息，乐得要命。第二天拂曉，我們得到了县委的批准，就向南波村出发。真倒霉，在南波的山頂上和楊良盛的一班軍事哨遭遇了，战斗在沒有把庄子包圍之前就打响了。結果被楊良盛的弟弟楊容盛帶了一枝駁壳和五枝步枪逃走了。楊良盛當場被打死，余下的枪又全部补充到我們团里。

这个战斗从开始到結束，前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基本上还是打得很漂亮的，特別是我們班长李海云，表現得最勇敢最机智，他一个人就繳来了六枝枪。有歌謠为証：

天上烏云变紅云
紅軍出了个李海云
李海云打仗真是强
一人繳了六枝枪

队伍从南波回到九都，正好碰到紅軍第五軍彭德怀軍长也从湖南浏阳赶来九都。无巧不成書，不知死活的国民党罗林部队就在这时候来攻打我們。

他們用两个团把我們圍在米棵山里。第二天半夜里，我們在彭軍长的指揮下，人不知鬼不曉地离开了米棵山，但是紅旗还仍旧駐它們在山頂上飄着。我們悄悄地繞到罗林的师部背后，給他来了个反包圍。

天亮以后，我們在山上的树丛中，瞅着罗林在山下的空地上集合了队伍，指手划脚地說了起来：

“……他們被我們包圍啦！已經一天一夜沒有飯吃啦！……”

他正吹的来劲，我們的重机枪响了。看来整齐而威严的队列，一下子象一团受惊的螞蜂似的到处乱钻。彭軍长举起手里的左輪枪，喊道：

“蓮花赤卫队员，冲下去繳他的枪啊！”

我們都象出了膛的子彈，刷地冲到山下。敌人的一个师部和一個团部就这样給消灭干淨。乡亲们又欢天喜地地編起了新歌：

彭德怀摆了空城計，
山上插着五面旗；
繞到山后打罗林，
打得罗林逃东又窜西。

这一仗共繳获了五挺重机枪，一百多枝步枪。因为我們地方武装并不很需要重武器，就把独立团繳获的两挺重机枪送給了紅五軍。彭軍长把我們表揚了一番，不但把繳来的一百多枝步枪全部給了我們，还另外送給我們二十八枝步枪和一枝駁壳枪。

从此，只有一枝枪的蓮花紅色独立团，全团每一个战士都有了一枝名符其实的真正的枪！

（陆揚烈記）

我跟父亲当紅軍

吳 华 奋

1928年，我十二岁。

那年夏天的一个漆黑夜晚，我家亲戚来合云突然来到我家里。打那以后，他和父亲就經常在一起背着母亲商量事情。許多話我听了似懂非懂，但却感到新鮮有味，什么共产主义、革命、暴动、爭取地主武装、掌握紅枪会等等。有一天晚上，我已經睡了，忽然，母亲和父亲吵起嘴来。母亲不住唠唠叨叨，說：“你参加那些紅党瞎干，不顧家，也不管孩子啦。”父亲說：“誰說不管，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了孩子們。”我轉身問父亲什么是土豪，他没好气地說：“快睡你的覺，小孩子打听什么。”不久父亲就参加了紅枪会（过去人家拉他去他都不去）。我一看紅枪会挺好玩，許多人在一起說說笑笑，热熱鬧鬧，也就莫名其妙的跟着去参加了。父亲在会里可是个大忙人，一天到晚东奔西跑，开会嘮咕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忙的什么。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父亲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他已三天三夜沒有回家了），屁股还没坐下，就喊：“小海！”我說：“做什么？”这时母亲端上飯来，父亲把飯推到一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說：“你拿上一个酒杯，去地主吳文路家借点盐，看看吳文路在家不在家。”我到地主家一看，吳文路正在吃晚飯。我轉来告訴了父亲。父亲戴上帽子，向外就走，剛跨出門一步，又回过头来对我說：“你去他門口玩，看他外出不，要外出，你就在他后面远一点跟着。看他到哪家后，你就快点到会堂来告訴我。他不出来，你就老待在他門口，到时候我要华高来找你。”我一直待到快到二更天，才看到紅枪会的人扛着梭鏢，拿着刀，靜悄悄地从四面八方

涌来。华高走在前面，問我吳文路出来沒有。我把吳文路的情况告訴他以后，紅枪会的同志們很快就把地主的房子包圍起来了。有人从房子上进到院子里，打开了大門，外面的人端着梭鏢，举着大刀，一拥而进。地主吳文路和他老婆正睡覺，沒等他爬起身来反抗，就被我們捉住，五花大綁地綁了起来。他老婆吓得两只手提着褲子，双腿跪在牆角落直哆嗦。我瞥了她一眼，她立刻就瞧着我說：“老侄儿，我們都是一族本家的，这……这是怎么回事。”我很得意地說：“我們都是共产党，現在該你們这些老財倒霉啦。”我又冲她吐了两口唾沫，就跟着大伙一块到后山去杀地主吳文路。到后山一看，底鋪子的恶霸华早、华能等四个坏家伙也拉来杀了。人們都在議論紛紛，說：“好，革命成功了；明天就宣布成立苏維埃。”我心里想，这一下我們都成了真共产党了，可好得很。我想找爸爸問問，可是到处找不着。我急了，就大声叫喊。华高跑到我眼前說：“你爸爸一会就来了，走，我們到祠堂去吧。”祠堂里已挤了好多人。到三更天时，父亲和来合云、朱文煥从大吳家回来了。来合云說：“明天成立苏維埃。”我小孩嘴快，跟着就問：“什么是苏維埃？我們現在是不是都是共产党了？”合云說：“好小子，你想当共产党嗎？老子是共产党，儿子大概不成問題吧！”华高接着說：“小家伙今晚上也算得一个，搞吳文路就是派他先去釘梢的。”来合云一把把我抱起来說：“小家伙不简单，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我說：“共产党是打地主的。”合云說：“不錯，共产党是为穷人謀福利的。苏維埃是为穷人办事的。”

第二天成立了乡苏維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儿童团、少年先鋒队等紅色組織；紅枪会改編为紅色补充軍第二团。华高当了团长，父亲是党代表。不久第二团就出发到东区去打地主的寨子，我也跟着大队人馬去了。

这是我过紅軍生活的第一課。我年紀小，个子低，就怕人家不要我，所以处处尽量装着象个大人样，父亲在前面走，我跟在他后边。我穿着一双象唱曲打板似的不跟脚的鞋。一路上，我模仿

着父亲那样一大步一大步的走，走着走着就被拉下了，于是我又踢踢踢踢地跑一阵才跟上。父亲只要听到这踢踢的声音，就准知道我掉队了，习惯地回头看看我，我也装着没事一样看看他。开始还可以，以后越走越吃力，最后父亲终于开口了，说：“你快给我回去吧，跟着一路不够垫脚板的。”我鼓鼓嘴，就是不回去。他说：“你非给我回去不行！”他脸色沉下来。我一看，胳膊撑不过大腿，就离开队伍，嘟嘟囔囔地往回走。走不多远，趁他不注意，又钻到队伍里了。又走了一会，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他毫不客气地又把我赶出来。我干生气也没办法，蹲在路旁，眼看一村的人都神气活现地从我前面过去了，父亲还在一旁监视着我，真急死人。幸亏有人叫他到前面有事，我才又趁机钻进了队伍，跟着大伙一块行军。这时大雪飘飘，风也呼呼地吹得挺紧，人们都耸着肩缩着头。约莫快到中午，父亲到后边来检查部队行军情况，我又被他发现了。他还是赶我回家。我说冻死在外面也不回去。他看没法，就从身上脱了件单衣给我包头。我嘴里说不冷，其实两只耳朵和脸上象刀子割，怎么也止不住上下牙打架。这时，本家吴华官大哥对父亲说：“你到前面去吧，我来招呼他。”父亲又瞅了我两眼，就到前面去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部队到达八里区南村，准备对龙盘寨、李山寨进行包围。部队到李山寨正西六里的李家楼，天刚拂晓，民团还在睡大觉，打了几枪，他们就吓跑了。我们团部就决定设营在这里。部队都上山围寨子去了。华官和文谋叔叔忙着杀猪作饭，我帮忙烧水。我到柴堆上去拉柴火，一拉发现了一根皮带。这是什么皮带呢？我顺手拉出来一看，原来是枝汉阳造步枪。我真高兴极啦。中午，华官、文谋给部队送饭时，将这个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即刻派人下山来把枪要去看看。我也一同跟去了。到了那里，华高团长看了枪，笑着对我父亲说：“好了，我们团有了一枝钢枪了。”父亲要我回团部去，把枪给他留下。我说什么也不肯。他说我不服从命令，要揍我，我才给吓走了。

1929年的春天，部队到油炸河以北的小村庄住下，防止大山寨的地主民团对苏区扰乱。这时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九枝步枪，上级又发来两枝撸把枪，是给团长和党代表的。有一次趁他们不在家，我偷偷地拿着枪玩弄。不知道枪膛内有一发顶膛火，一拨弄，叭的一声，将老百姓的一条黄牛给打死了。我吓得要死，急急忙忙去找团部司务长。司务长是个老成人，平时最喜欢我们这一帮小鬼，他看我吓得那个样，又好笑又好气。他说：“你们这些小鬼呀，光给我找麻烦，你知道，赔老百姓一条牛要十四块铜洋。”说着就找老乡去了。过了不大一会，父亲回来了，一听此事，可发了大火，顺手甩了我两个耳光，又把我关起来，不给我饭吃，非要我答应让文谋送我回家不行。这时虽然我脸上火辣辣的，但我却不哭。我知道父亲是个刚强人，从来不喜欢看哭涕摸泪的人。不过我心里暗自思量：这一下糟透了，如果他真派人硬把我送回去怎么办呢？正想着，华高团长来了，他训了我几句，叫我以后千万听话，就把我放了出来。这下我可高兴啦！就又去烧水了。谁知一锅水没烧开，父亲又来找我。他气呼呼地跑来说：“三番五次地说你年岁太小，不懂事，跟着尽捣蛋，要你回家去等二年再来，你就是不听……。”我只好向他苦苦哀求说：“去年都跟上了，今年还不行吗？你枪内上了顶膛火，我以为是空枪才弄响了，今后我好好地干，听你的话，还不行吗？”刚说到这里，华高带着许多人拥进来，一齐要我唱歌。我估计这可能是替我解围的。我看了父亲两眼，就站起来唱：

正月是新年，	穷人好可怜，
少吃无穿，	忍饥受寒；
富人住高楼，	皮袍棉袄，白炭火烤，
鱼肉吃不了。	

二月是花朝，	工农革命到，
打倒土豪，	土地分了。

.....

我越唱越带劲，一面唱一面就表演起来。一气唱完了十二月，累得我满头汗，呼呼直喘。大伙哈哈直笑，我看到父亲也扭过脸去偷偷地笑了。最后，他转过身来，又板起面孔对我说：“从明天起，每天除工作外，要学习两个字，再胡捣蛋，非叫你滚回家去不可。”我伸了伸舌头，连声说好。

半个月以后，部队改编，我们编为红十师。华高他们都到二十八团去了，父亲在军部休息。因为我年龄小，就叫我到少先队去当小兵，也没有枪。三、四十个小鬼在一起，除了行军，就学文化，上政治课。什么是阶级，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这些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很深地印在我脑子里，更坚定了我干革命的意志。

一个多星期以后，父亲和来选刚同志一道来找我，他告诉我上级要他回后方，到光县东区去工作，要我同他一道回去。我说：“你回你的，我是不回去。”父亲说回去送我上学念书。我说：“不，这里人多热闹，我们每天也都在学习，哪里的学校也赶不上军队这个大学校。”他看我很坚决，也就不再劝我，但是要我每个月给他写一封信。我说：“爸爸你回去，我会好好的干，放心吧。”他老人家走了不一会又回来了，在老百姓家买了一双布鞋给我，亲手给我穿上，手摸着我的头，又看了看我的脸，说：“以后千万要听同志们话。”我嗯了一声，不知怎么就哭起来了。他的眼中也充满了泪，但是没掉下来。他转身向我们上级交代了几句话，就走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爱护我和严厉管教我的最敬爱的父亲。

1932年，我在河口战斗负伤，到罗山休养时，听说父亲随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了。1935年，我长征到宁夏花马池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到处去打听父亲的去向。后来见到了熊起松、吴华江两同志，他们才告诉我，父亲在四川牺牲了。

我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恸，就偷偷地跑到村外，倚在一棵大树上放声大哭起来。从父亲的牺牲，又联想到母亲及全家的香

无音信，越哭越伤心，直哭得天昏地暗。

突然，我模模糊糊觉得有人站在我旁边，我回头一看，是党的总支部書記文明地。我揉了揉眼要站起来，他却把我按住，随后他就坐在我的身旁，一边用手撫摸着我的头，一边說：“你知道誰把你父亲打死了？”我說是国民党反动派。他說：“你父亲为什么被他們打死？”我說是为了咱穷人翻身鬧革命。他劝慰我一番，然后告訴我：“不要哭了，我們手中有枪，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討还血債！”他拉着我的手站了起来說：“回去吧！同志們都在等着你。”黑暗里，我跟着这位对我关怀体貼倍至的同志，走向部队。我又感到了慈父般的温暖，这是巨大的党的温暖，父亲倒下了，党把我撫育长大成人了。

几天以后，我又和大家一起背起行装，踏上了征途，沿着老共产党员、我的父亲沒走完的道路，前进了。